

# 新时代我国人口负增长 中长期变化特征、原因与影响探究

陆杰华 刘瑞平

**摘要:**文章基于1990—2015年全国人口历史数据以及未来30年的人口预测,对我国人口负增长中长期发展变化轨迹做出预判。结果显示,我国人口负增长中长期具有以下变化特征:到来时间速度快,年龄结构发生扭曲,少子化与老龄化并存,人口总量下降速度快,老龄化和高龄化速度快、程度高、规模大等。目前,我国正处于人口负增长惯性变化的重要节点,人口负增长趋势已不可逆转。综合而言,导致新时代我国人口负增长产生的主要原因包括生育水平、年龄结构等人口自身因素和政策、文化等社会因素,新时代人口负增长将对我国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多重影响。文章最后就如何迎接、适应和应对新时代我国人口负增长展开了政策性讨论。

**关键词:**人口负增长;特征;原因;影响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20)01-0019-10

**DOI:**10.15993/j.cnki.cn35-1198/c.20200311.017

## 一、引言

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人口问题是国家基础性、战略性和全局性问题,党和国家历来重视人口发展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长期的低生育水平,使人口负增长惯性不断积累,未来中国人口规模将会持续缩小<sup>[1]</sup>,我国人口将在2025年左右达到峰值,之后开始迅速下降<sup>[2]</sup>,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的趋势难以逆转。面对人口发展出现转向的重要变化,2016年我国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并制定了《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过往已有不少学者对全国人口发展趋势进行过多次预测,前瞻性预判生育政策及不同生育水平对未来人口的影响,并对未来我国人口负增长到来的时间节点、人口变动趋势及对策进行了分析。<sup>[2][3][4][5][6]</sup>虽然人口负增长即将到来已成为共识,对未来人口负增长的主要特征等进行了分析<sup>[7]</sup>,但很少有研究对我国人口负增长的发展轨迹和中长期人口变化特征进行规律性探索,并且对人口负增长的原因、影响和干预策略等方面认识依然不清晰<sup>[8][9]</sup>。因此,本文在新时代我国

**收稿日期:**2019-12-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实现人口经济社会健康老龄化的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6JJD840004)。

**作者简介:**陆杰华(1960—),男,人口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

刘瑞平(1989—),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

人口负增长时期即将到来之际,基于全国历史人口数据以及对未来30年的人口预测数据,客观研判我国人口负增长的中长期发展轨迹,动态分析我国人口负增长中长期变化特征,对未来人口负增长阶段的人口特征进行前瞻性探索,对新时代我国人口负增长产生的原因和影响进行分析,并就如何迎接、适应和应对人口负增长展开政策性讨论。在新时代背景下,加强人口负增长相关研究,对于正确认识人口负增长,制定合理的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以及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政策意义。

## 二、新时代人口负增长中长期变化的主要特征

### (一)数据与方法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1990—2015年全国人口历史数据(包括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及抽样调查数据)以及对2020—2050年的人口预测数据。在人口预测方面,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队列要素人口预测法,利用中国人口预测软件(CPPS)对2011—2050年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分析。人口预测所涉及的参数设置主要有四个,分别是生育、死亡、出生性别比和迁移。本研究假设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在2025年恢复到107的正常水平,之后一直到2050年都维持着这一水平。在迁移参数的设置方面,考虑到国际迁移人口对中国人口的影响作用较小,本研究假设人口国际迁入迁出相等净迁移为0。本文采用人口预测值与2015年“小普查”统计数据相拟合方法来确定2011年的生育水平,最终设定总和生育率为1.45,并假设未来生育水平发展的高中低三种方案。

鉴于2010年人口普查中的婴幼儿死亡数据质量存在问题,本文采用Coale-Demeny模型生命表(西区),对全国分性别0—4岁婴幼儿死亡率进行修正,编制出全国分性别单岁组生命表作为预测人口的死亡水平和模式的起点,该方法被证明具有较好的合理性和稳定性。<sup>[9]</sup>在确定未来全国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速度方面,本文参照联合国结果<sup>[10][22]</sup>,设定预测期间分性别的平均预期寿命值。生育和死亡水平的具体设置结果见表1。

表1 人口预测期间的参数设定

参数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2030年	2050年
总和生育率	高方案	1.45	1.6	1.8	1.8	1.8
	中方案	1.45	1.5	1.65	1.6	1.6
	低方案	1.45	—	—	—	1.3
平均预期寿命	男	74.6	75.6	76.5	78.3	81.6
	女	79.7	80.2	81.0	82.2	84.6

### (二)本文与以往研究的预测结果比较

以往学者在不同时间对全国未来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进行了预测,因此首先将本文对全国的人口预测结果与以往结果进行比较(见表2)。以往人口预测对我国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设置均高于实际统计水平,虽然总人口规模预测较为保险,但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问题被严重忽视<sup>[1]</sup>。从各个预测结果来看,在低生育水平下,未来我国人口负增长出现在2030年及之前、人口老龄化严峻形势成为共识,尤其是把全面二孩政策因素考虑在内的最新预测,都显示生育政策的调整在未来30年难以阻挡人口负增长趋势。从人口负增长时间到来的速度来看,欧洲的生育率开始下降到人口负增长到来这中间间隔跨越了一个多世纪,而发展中国家的时间间隔将短得多<sup>[13]</sup>,我国20世纪从70年代生育率开始下降到2030年及之前出现人口负增长,中间间隔约60年,可以看出,我国人口负增长到来的速度之快。

表2 中国未来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预测比较

预测结果来源	总人口(亿)				高峰年份	少儿人口比例(%)				老年人口比例(%)			
	2020年	2030年	2040年	2050年		2020年	2030年	2040年	2050年	2020年	2030年	2040年	2050年
李建新 <sup>[2]</sup>	14.2	14.2-	13.6-	12.7-	2024-	16.4-	13.9-	11.4-	10.5-	11.7-	15.9-	21.5-	23.0-
		14.3	14.0	13.4	2026	18.9	17.3	15.2	15.3	12.1	16.9	23.8	26.7
陈卫 <sup>[4]</sup>	14.3	14.4	14.3	13.8	2029	18.50	15.8	15.1	15.2	12.0	16.6	22.4	23.9
翟振武等 <sup>[6]</sup>	14.3	14.5	14.3	13.8	2029	18.20	16.6	13.5	14.2	12.7	17.5	24.0	26.0
王广州 <sup>[11]</sup>	13.7-			12.2-	2026	14.8-			10.4-	13.4-			27.5-
	14.1			13.9		16.8			14.2	13.8			31.4
WPP 中方案 <sup>[10] [9238]</sup> (UN, 2017)	14.3	14.4	14.2	13.6	2029	17.5	15.4	13.9	14.0	12.2	17.1	23.8	26.3
WPP 中方案 <sup>[12] [9261]</sup> (UN, 2019)	14.4	14.6	14.5	14.0	2029	17.7	15.8	14.3	14.2	12.0	16.9	23.7	26.1
本文 中方案	14.0	14.1	13.8	13.2	2026	16.9	14.2	12.3	12.5	13.1	18.4	26.0	29.2
本文区间	13.9-	13.8-	13.4-	12.5-	2023-	16.3-	12.7-	10.7-	10.2-	13.0-	17.1-	25.3-	27.9-
	14.1	14.3	14.2	13.8	2030	17.4	15.4	13.6	14.3	13.2	18.8	26.9	30.9

(三)新时代人口负增长变化的特征

1.人口负增长的规模特征

从全国人口总体规模来看,由图1—2显示,在1990—2000年间,全国人口仍然有着相对较快的增长势头,由1990年的约11.43亿人,增加到2000年的约12.66亿人,年均增长率维持在约1%。2000年之后,人口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到2010年为13.08亿人,其年均增长率仅为0.5%左右。未来中国在21世纪30年代及之前进入人口负增长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从这三个方案的生育设置来看,如果全国的TFR的水平一直维持在1.6左右,全国总人口将会在2030年之前便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假如全国平均生育水平在放宽计划生育政策条件下出现较大幅度的反弹,到2020年TFR升高到期望水平1.8,之后继续维持这一水平,那么人口负增长时代将会被推迟到21世纪30年代初,但推迟时间较短。高中低方案的人口峰值年份分别是在约2030年、2026年和2023年,峰值分别为14.34亿人、14.14亿人和13.96亿人,总人口达到峰值之后开始进入下降阶段。新时代我国人口负增长阶段,虽然仍保持较大规模的人口总量,但当人口达到高峰之后,开始不断缩减,缩减的速度越来越快,在2045—2050年间,人口总量的年均增长率将会降低到-0.80%至-0.36%之间,在中低方案情境下,2050年及之前的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28%和-0.41%。小的负增长率(通常为-0.3%)将会严重威胁到一个国家长期生存能力<sup>[14] (P130)</sup>,而我国到2050年,人口负增长率将在警戒线以下,未来人口总量缩减形势不容乐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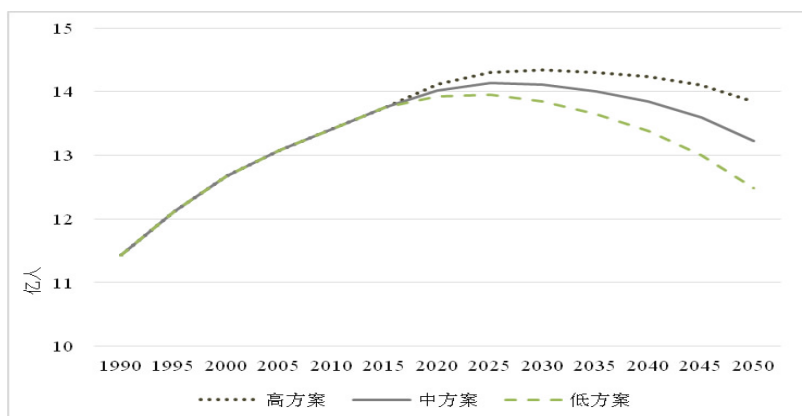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人口规模变动趋势:1990—2050年

数据来源:(1)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9[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2)本文人口预测结果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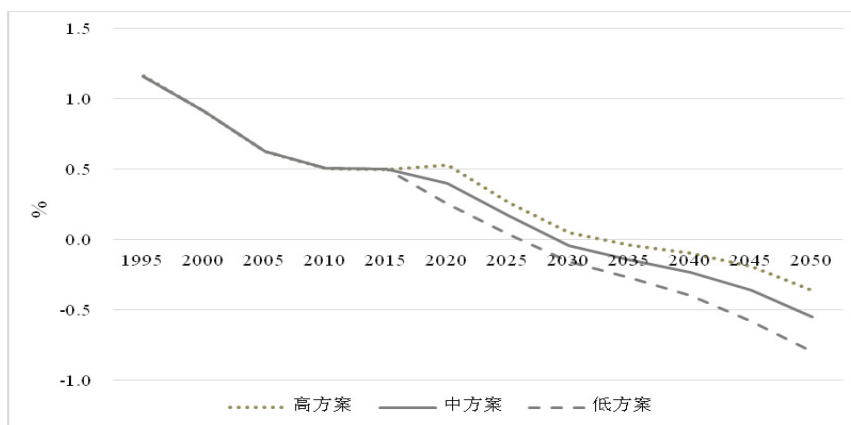


图2 不同预测方案下未来中国人口总量年均增长率

数据来源:同图1

## 2. 人口负增长的自然变动特征

从人口自然变动的要素来看(见图3),1990—2026年,即人口负增长阶段到来之前,我国的粗死亡率继续维持着下降趋势,我国老年人口比例略微升高,粗出生率对人口增长的作用大于粗死亡率,出生人口能够弥补死亡人口,因此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在0值以上,并呈现与粗出生率基本相同的趋势。生育水平下降到一定程度,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重,直到2027年前后我国将出现粗出生率与粗死亡率交叉。因此,在新时代人口负增长阶段,我国人口自然变动模式发生逆转,我国的粗出生率将处于稳定的低水平状态,而粗死亡率将打破原来的稳定低水平状态,呈现加速上升的趋势,粗死亡率高于粗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处于负值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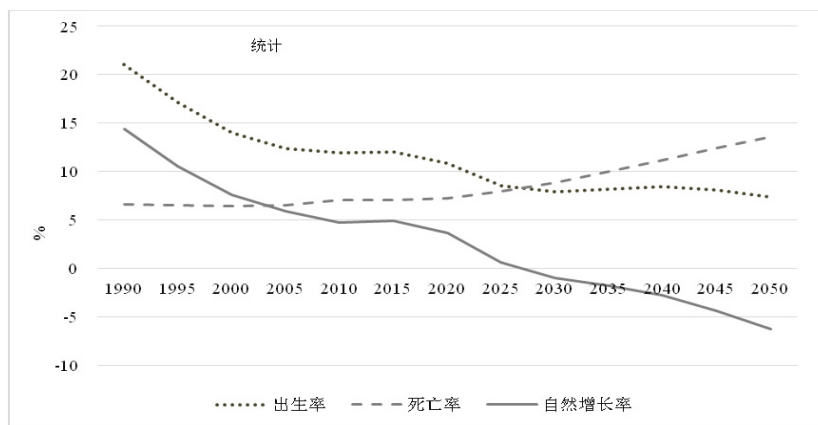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人口自然变动趋势:1990—2050年

数据来源:同图1

## (四)人口负增长的人口结构变动特征

### 1.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特征

少儿人口(0—14岁)、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和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等年龄结构的变化影响我国未来人口增长的动力以及人口负担情况。图4结果显示,我国少儿人口总量的最大峰值出现在1995年前后,约为3.2亿人左右,1995年以后,少儿人口规模一直处于负增长的状态,而少儿人口比例在1990年以后,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2015年及之前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仍处于增长趋势,之后开始进入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峰值出现在2010年前后,约为75%左右,之后开始下降,按照中方案预测结果显示,到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约为7.7亿

人,比2015年时的劳动年龄人口峰值下降了约23%,下降速度快。1990年之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不断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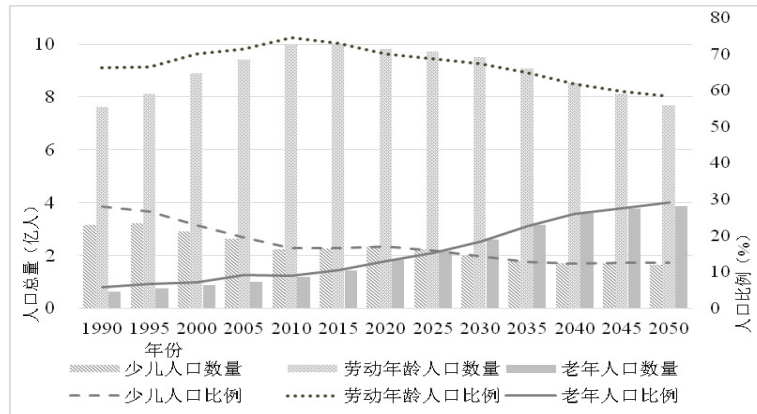


图4 中国人口年龄构成变化(2015年以后为中方案的预测部分)

数据来源:同图1

比较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新时代我国人口负增长的特征。由高中低三种方案预测的结果显示(见表3),人口负增长时期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急剧的转变。不管是哪种方案,到2050年,我国的少儿人口比例很难超过14.5%。本文假设高中低三种预测方案的死亡水平相同,因此老年人口规模在未来的变化相同,其比例也相差较少。按照中方案,在2027年前后,我国的老年人口规模和比例分别超过少儿人口规模和比例;到2050年,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达到3.86亿人,中方案显示老年人口比例在2050年接近30%,其二者分别是中方案的少儿人口规模和比例的2倍还多,未来少子化老龄化趋势异常严峻。本文预测结果显示2020—204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最快的时期,2040年以后其增速放缓,但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规模和比例在未来30年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到2050年,其数量约为1.27亿人,其比例接近10%。因此,中国老龄化和高龄化趋势并存,高龄化成为老龄化中一个比例较高的重要部分。

表3 未来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

年龄结构	方案	2020年	2025年	2030年	2035年	2040年	2045年	2050年
规模(亿人)								
0—14	高方案	2.46	2.41	2.20	1.98	1.94	1.99	1.97
	中方案	2.37	2.25	2.00	1.78	1.71	1.71	1.65
	低方案	2.27	2.06	1.75	1.52	1.44	1.38	1.27
15—64	高方案	9.82	9.73	9.54	9.17	8.70	8.35	8.00
	中方案	9.82	9.73	9.51	9.08	8.54	8.13	7.71
	低方案	9.82	9.73	9.49	8.98	8.35	7.86	7.36
65+	高/中/低方案	1.83	2.16	2.60	3.15	3.60	3.76	3.86
80+	高/中/低方案	0.33	0.39	0.51	0.70	0.81	1.01	1.27
比例(%)								
0—14	高方案	17.44	16.84	15.35	13.87	13.63	14.09	14.27
	中方案	16.90	15.91	14.20	12.70	12.33	12.56	12.51
	低方案	16.30	14.75	12.65	11.16	10.74	10.63	10.19
15—64	高方案	69.59	68.06	66.54	64.09	61.11	59.26	57.83
	中方案	70.05	68.82	67.40	64.80	61.70	59.81	58.28
	低方案	70.55	69.77	68.59	65.76	62.39	60.47	58.89
65+	高方案	12.97	15.10	18.11	22.03	25.26	26.65	27.91
	中方案	13.06	15.27	18.40	22.50	25.97	27.63	29.21
	低方案	13.15	15.48	18.76	23.09	26.87	28.89	30.93
80+	高方案	2.37	2.75	3.52	4.86	5.71	7.14	9.16
	中方案	2.39	2.78	3.58	4.96	5.87	7.41	9.59
	低方案	2.41	2.81	3.65	5.09	6.07	7.75	10.16

数据来源:本文人口预测结果

## 2. 人口抚养比的变动特征

由图5可知,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在2010年达到低谷以后,开始逐渐升高,到2050年超过70%。从总抚养比构成来看,1990年以来以及未来30年,整体上,我国人口少儿抚养比呈波动下降趋势,老年抚养比呈波动上升趋势。在人口负增长阶段到来之前,我国的少儿抚养比仍高于老年抚养比,这一时期,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负担仍然是少儿人口,但在人口负增长时期,人口总体规模开始不断缩减,老年人口规模开始大于少儿人口规模时期,老年抚养比也超过少儿抚养比,我国由育儿负担转变成养老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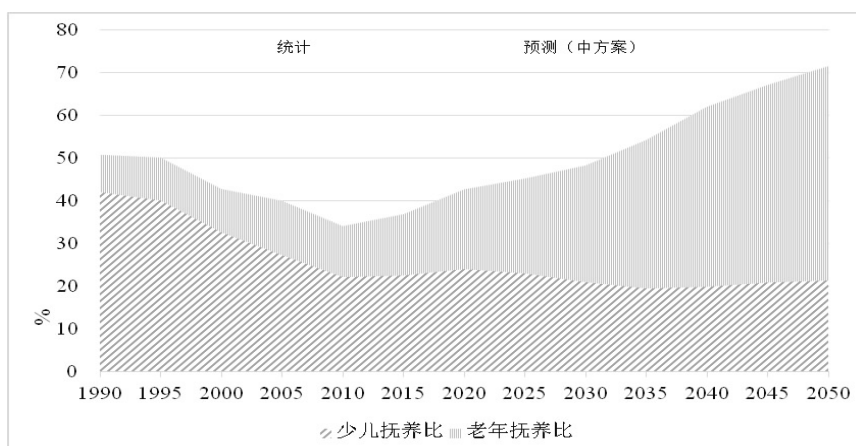


图5 中国人口抚养比变动趋势:1990—2050年

数据来源:同图1

## 三、新时代我国人口负增长形成的主要原因分析

人口负增长并非新现象,过去也曾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原因分为外部因素(包括战争、流行病、自然灾害、环境污染、郊区化、迁出、经济衰退、社会政策干预等)和人口自身的内部因素(包括低生育率、高死亡率等)。现代社会人口负增长的形成原因具有新的特点。<sup>[13]</sup>新时代我国人口负增长到来的主要原因可以分为人口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 (一)人口自身变动和结构是导致人口负增长的关键因素

人口自然增长的动力来自生育率、年龄结构和粗出生率、粗死亡率之间的反馈<sup>[14][18]</sup>,低生育水平、年龄结构的扭曲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等人口特征是导致人口负增长的重要因素<sup>[15]</sup>。在现代社会中,低生育率是导致国家人口负增长的关键因素<sup>[16]</sup>,并且生育率下降的速度越快,对人口规模减少的动力越强<sup>[17]</sup>。由于我国的生育转变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并且我国的低生育水平已经持续较长时间,早在1990年,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已经变为负数,人口负增长惯性已经在不断积累<sup>[1]</sup>。我国长期的低生育水平使人口年龄结构扭曲,其中少儿人口规模和比例下降,老年人口规模和比例增加,少子化老龄化突出,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开始老化,未来我国将处于一个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育龄妇女人数开始减少、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典型老龄社会,即使把生育水平提高到适度合理范围(不会远高于更替水平),出生人数也无法抵消其他年龄人口的死亡人数,人口负增长的趋势也无法阻挡,并且现代社会的少子化老龄化程度将会进一步加剧人口负增长形势。<sup>[15][16]</sup>

### (二)社会因素对人口自然变动的间接影响加快人口负增长的形成

间接影响新时代我国人口负增长的社会因素主要包括社会政策、生育文化、性别平等、社会经济发展等。我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快速

下降,总和生育率已处于低水平状态,育龄人口规模和比例持续降低、性别比失衡,加重了人口年龄性别结构的扭曲,目前人口年均增长率速度放缓,人口总量也只是在惯性增长。另外,现代育龄人口越来越重视个体独立自由生活,越来越重视自我感受,不婚和丁克家庭比例上升,倾向于少生的生育文化占据社会优势地位。随着社会性别平等的发展,女性和男性一样能够接受高等教育,进入劳动市场,提高了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家庭经济收入做出贡献,获得经济独立,女性在生育行为方面获得更大的掌控权,而生育子女的经济投入和机会成本不断增加等因素导致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之间产生冲突,这些因素导致未婚比例增加、婚育年龄推迟、生育间隔增大和生育子女数量较少,使生育率急剧下降<sup>[13]</sup>,以个人为导向的社会领域的性别平等上升到高水平,而以家庭为导向的社会领域的性别平等保持着低水平状态,二者的矛盾导致现代低生育率继续下降<sup>[18]</sup>。

### 四、新时代人口负增长中长期的多重影响分析

我国人口负增长阶段的到来不仅意味着人口数量和结构特征的转变,也预示着整个社会的转型。<sup>[8](P47)</sup>新时代人口负增长将对未来我国的环境、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宏观层面产生重要影响,也将对社区、家庭以及个人等中观和微观层面产生影响。相比于中观和微观层面,分析新时代人口负增长对宏观层面的多重影响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中长期战略以及完善当下的社会政策更为迫切。新时代人口负增长对我国各方面的影响并不一定都是消极的,也可能是积极的,应该针对社会不同方面、未来应对政策以及可能的实施效果等进行具体分析。

#### (一)人口负增长对环境的双向影响

新时代人口负增长对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人口缩减是未来自然环境改善的福音。人口负增长一方面能够使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冲突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对于解决现在的人口密度较大、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等城市问题也具有积极作用,因此人口负增长对于人们的生活环境质量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人口负增长对人工物理环境的影响更多的是消极作用,研究发现,人口减少和经济衰退会加剧城市收缩<sup>[19]</sup>,人口自然下降是我国城市收缩的主要驱动力,城市收缩已经成为东北地区最普遍的现象<sup>[20]</sup>,预计新时代我国人口负增长时期将会有更多的城市出现收缩。而城市收缩会产生较高的成本,包括城市土地和住房等闲置、基础设施使用不足、经济衰退等。

#### (二)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和技术的双向影响

新时代我国人口负增长时期,人口年龄结构发生转变,劳动年龄人口继续下降,老年人口不断增加,人口负担不断加重,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机会窗口将会关闭。扭曲的年龄结构导致劳动力供应不足、国内需求下降、市场萎缩、投资下降、降低生产能力等,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sup>[6]</sup>,而税收收入减少,会加重国家在社会保险、医疗等方面的财政负担,这将对我国的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人口负增长也可能为新时代技术、管理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机遇。老龄社会以慢性病、残疾为主的医疗需求会促使我国加大在神经病学、风湿科、康复医学等医疗卫生方面的投资<sup>[21]</sup>,这将有助于提高防治老年疾病方面的医疗技术进步。养老市场需求增大,劳动力对市场供应不足,尤其是老年护理服务等将会给社会带来人力、财力方面的压力,这将会促使企业不断推进养老服务科技创新以及其他技术的进步,在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同时也为整个人群提供便捷。另外,老年人积累了较高的社会资本,人口负增长会促使社会寻找激活和开发这一隐形资本供应的方法,因此人口负增长将成为创新人力资源管理方法、科学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

以及经济增长的诱因。<sup>[18](P61)</sup>

### (三)人口负增长加剧地区间发展不平衡

人口规模下降、年龄结构老化,有可能导致国内需求下降,劳动力供应日益稀缺增加企业的工资压力,会使市场前景下滑,投资减弱,企业竞争力下降,如果廉价进口取代国内供应,未来我国以制造业、中低端产业为主的一些省份或地区将会受到冲击。<sup>[16]</sup>人口缩减、经济衰退、城市萎缩和老龄化将会相互交织,很容易使某些经济薄弱的中小城市以及农村地区进入社会发展的恶性循环。因为随着持续较低的生育水平,人口增长缓慢或停滞,经济发展程度较低,较少的就业机会导致大量人口净流出和净迁出,而人口外迁加剧老龄化程度和城市收缩,增加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养老负担,造成财政赤字,进一步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与之相反,东部以及中西部地区一些富有吸引力的城市,虽然生育率处于较低水平,但人口迁移的机械人口增长将会弥补人口自然负增长的损失,出现城市收缩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因此,面对未来人口负增长,那些处于劣势地位的地区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 (四)人口负增长对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影响

新时代人口负增长时期是一个老龄化社会,一个以年轻人为主导的社会向老龄化社会过渡将会对原有社会文化和政治产生影响。“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优良文化的传承有利于营造尊老敬老的生活氛围,然而目前以崇尚年轻、效率的文化在市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倾向于忽视老年人需求,存在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sup>[21]</sup>。新时代人口负增长阶段,随着老年人规模越来越大,人力资本潜在资源的开发促使更多的退休老人继续在各种社会参与中发挥重要作用,对老年人的偏见和歧视将会受到冲击,从而产生新的适应老龄社会的文化氛围<sup>[23]</sup>。新时代我国社会各界将越来越重视老年人的诉求,尤其是未来步入老年期的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将会提高,他们不仅比年轻人积累更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个人的权利意识也将会提高,因此老年人在民间社会和政治决策中可能拥有更多的正式和非正式权力。<sup>[18](P47)</sup>

##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未来我国人口进行预测,并对人口负增长的发展轨迹和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人口负增长到来时间的速度快,人口总量虽然大,但年龄结构扭曲,少子化老龄化突出,人口总量、少儿人口以及劳动年龄人口下降速度快,老龄化和高龄化速度快、程度高、规模大。目前我国正处于人口负增长的前夜,本文中方案人口预测未来我国将于2027年左右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新时代我国未来人口负增长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人口负增长虽然对我国某些方面的影响有可能是积极的,但未来应该关注人口负增长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我国人口负增长具有时间到来速度快、人口下降速度快等特征,会对未来社会各方面产生潜在风险,更应该前瞻制定应对人口负增长的人口发展战略以及相关社会政策。应对人口负增长的潜在风险,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转变以往人口思维观念、树立新的人口观是应对人口负增长的思想基础。长期以来世界被人口过度增长的思维方式所主导,虽然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人口下降期,人口负增长受到日益关注,但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口充裕问题继续在社会、科学和政治议程等方面占主导地位<sup>[13]</sup>,从目前人口发展战略和规划来看,我国人口治理理念还没有彻底摆脱总量人口问题观念的阴影<sup>[24]</sup>。人口负增长不能再用持续的增长思想来解决,需要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人口下降不再是稀缺,而是一种常态,需要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人口负增长<sup>[13]</sup>,但面对人口负增长的到来以及对新时代我国社会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可能潜在负面影响,国家、社会和个人不应过



度恐慌,人口负增长将成为不可控的事实,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去试图扭转它<sup>[8](P45-46)[25]</sup>,而是适应它,并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应对。

其次,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应对人口负增长的制度保障。新时代人口负增长阶段,人口总量减少与老年人口增加相随,老龄化和高龄化并存,高龄化严峻趋势将会进一步加重我国老龄化形势,应对老龄化的挑战将成为人口负增长时期的重中之重。因此未来我国需要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养老金体系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发挥社会保障在老年贫困中的兜底功能,将社会性别视角纳入社会公共政策中,给予针对男性和女性空巢老人不同需求提供不同的照料服务<sup>[26]</sup>,另外,还应该侧重关注处于老年群体劣势的女性高龄老年人。

再次,以教育和科技进步来增加人力资本是应对人口负增长的经济保障。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市场需求低迷的新时代人口负增长时期的老龄化社会,需要通过教育提高人口素质,增加人力资本,这将有效降低人口下降所造成的经济损失。<sup>[25]</sup>另外,以激发养老产业市场活力来补偿市场需求低迷态势,加大在养老服务领域的科技创新,推动人工智能等在智慧养老方面的应用,为老年人提供更为高效便捷的高质量服务,改善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通过提高整体老年群体的健康水平,才能为开发“健康红利”和“长寿红利”奠定基础。在人口下降的压力下,需要通过适当灵活的措施延迟退休年龄,促进老年人的家庭照顾和社会参与,提高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开发老年人口的健康红利和人力资源,实现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

最后,提高生育水平是应对人口负增长的有效途径。出生、死亡和迁移是人口负增长的三个关键因素,其中国际移民并非应对人口负增长的有效方法,因为移民的生育水平会很快下降到与当地民众基本相同的生育水平,而且世界净迁出国家的生育水平也在不断下降<sup>[13]</sup>;另外,以吸引国际移民来减缓人口下降的方式可能会带来副作用,因为国际移民增多会导致民族人口的文化、种族、语言等方面发生改变,可能会引起冲突,加大社会治理的难度。<sup>[14](P150)</sup>采取鼓励生育的相关政策虽然不能够在短时间内改变人口负增长的趋势,但长远来看仍有重要影响作用,对减缓人口负增长趋势、降低负增长的人口规模、改善扭曲的人口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国家政策应该回归努力提高生育率方向上,新时代生育政策配套体系构建要确保与经济社会政策协调发展,坚持以女性就业为核心、托育照料为重点、健康服务为基础等。<sup>[27]</sup>

### 参考文献:

- [1]王丰等.21世纪中国人口负增长惯性初探[J].人口研究,2008(6).
- [2]李建新.不同生育政策选择与中国未来人口[J].人口研究,1997(1).
- [3]曾毅,金沃泊.中国未来人口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91(3).
- [4]陈卫.中国未来人口发展趋势:2005—2050年[J].人口研究,2006(4).
- [5]郭志刚.六普结果表明以往人口估计和预测严重失误[J].中国人口科学,2011(6).
- [6]翟振武,陈佳鞠,李龙.2015—2100年中国人口与老龄化变动趋势[J].人口研究,2017(4).
- [7]陆杰华.人口负增长时代:特征、风险及其应对策略[J].社会发展研究,2019(1).
- [8]Hospers G, Reverda N. Managing Population Decline in Europe's Urban and Rural Areas. 2015th ed [M]. Cham: Springer Verlag, 2015.
- [9]李建新等.中国城乡生命表编制方法探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8(3).
- [10]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7 Revision. Volume I: Comprehensive Tables[R]. 2017.
- [11]王广州.中国人口预测方法及未来人口政策[J].财经智库,2018(3).
- [12]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 Prospects: The 2019 Revision. Volume I: Comprehensive Tables[R].2019.
- [13]Reher D S..Towards Long-Term Population Decline:A Discussion of Relevant Issues[J].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2007,23(2).
- [14]Teitelbaum, M S. and Winter J M. The Fear of Population Decline[M].San Diego:Academic Press, 1985.
- [15]Johnson K M..When Deaths Exceed Births:Natural Decrease in the United States[J].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1993,15(2).
- [16]Coleman D, Rowthorn R..Who's Afraid of Population Decline?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Its Consequences[J].Population & Development Review,2011,37(Supplement s1).
- [17]O'Neill B C, Lutz S W..The Long-Term Effect of the Timing of Fertility Decline on Population Size[J].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99,25(4).
- [18]McDonald P. Gender Equity,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 Future of Fertility[J].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earch,2000,17(1).
- [19]Kantor-Pietraga I.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s as an Explanation of Depopulation of Cities on the Area of Poland[J].Environmental & Socio-economic Studies,2014,2(3).
- [20]Li H, Mykhnenko V..Urban Shrinkag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2018,184(4).
- [21]Yang G, Wang Y, Zeng Y, et al. Rapid Health Transition in China, 1990—2010: Findings from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0[J].The Lancet,2013,81(9882).
- [22]吴帆.认知、态度和社会环境:老年歧视的多维解构[J].人口研究,2008(4).
- [23]Biggs, S..The Promise of a Long Life Cultural Adaptation to Productive Aging, Spiritual Empathy,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J]. Journal of Religion, Spirituality & Aging,2014,26(2-3).
- [24]穆光宗.转折中的中国人口——《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解读[J].中国社会工作,2017(5).
- [25]Lutz W..Fertility Rates and Future Population Trends:Will Europe's Birth Rate Recover or Continue to Decline?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drology,2006,29(1).
- [26]王德文等.空巢老人健康及照料性别差异之启示[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3(1).
- [27]朱荟等.新时代生育政策配套体系建构的内涵、挑战及顶层设计探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8(10).

[责任编辑 林娜]